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 局部抗战的形成

第一节 一二八事变

一、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兴起了抗日救国高潮。在日商日货比较集中的上海,人民群众抗日浪潮如火如荼。9月22日,上海市人民群众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后,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10月19日,上海市商会组织了对日经济绝交实施委员会。广大市民自觉参预抵制日货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1930年,由上海进口的商品,29%(月平均数)来自于日本,到1931年12月,直线下降为3%。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开展业务的日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本航运公司也遭受沉重打击,日清轮船公司的所有船舶被迫全部停航。在沪的日资企业共有 125 家,至 11 月底,已有 80% 被迫关闭,至 12 月底,关闭数达 90% 以上。^①上海市民还建立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制定了《义勇军团体编制训练暂行计划大纲》。截止到 11 月 17 日,报名参加义勇军的人数已达 17 000 余名。^②

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策应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鼓舞鼓动了全国人民。

面对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政府曾无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抗议”,遭到中国方面的驳斥。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乃决定诉诸武力,威胁南京政府,强迫其承认日军侵占东三省为既成事实,并取消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此时,日本政府为使其侵占东北“合法化”,正在拼凑伪“满洲国”。为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焦点,遂决定在上海挑起事端,扩大侵华战争。

1931 年底,板垣征四郎电示日本驻沪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汇给田中两万日元经费。田中随即与民族败类、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璧辉,清王朝肃亲王之女)进行了密谋策划。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日本山妙法寺的上海传教主持者天崎启升及水上秀雄等 4 名日莲宗信徒赴杨树浦做“寒修行”,来到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前,这是一家以抗日活动而闻名的中国工厂。当时,该厂义勇军正在进行操练。天崎一行突遭由田中、川岛芳子指使埋伏于该厂附近的日本浪人及若干汉奸的袭击。袭击者共 20 余人,他们高喊:“是日本人,杀死他们。”双方遂互殴。事后,日本诬陷中国义勇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 365、366 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 368 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军袭击日僧,声称有一名受伤僧人死于日本医院。1月19日子夜,田中又指使其属下“日本青年同志会”的60余名会员,冒雨闯入三友实业社寻衅施暴。1月20日凌晨2点半钟左右,这伙暴徒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仓库和部分厂房。在仓惶逃离三友实业社至华德路时,与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华籍巡捕被暴徒用刀砍死两名,砍伤两名。暴徒亦被击毙一名,重伤两名。此即所谓“日僧事件”的全部经过和真相。战后,日方的所有资料都证实:“这次事件其实是田中隆吉少佐等搞的阴谋,为转移各国对建立满洲国的注意力。”^①

1月20日下午1时,田中等煽动在沪日本侨民及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集会,要求“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增派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消灭抗日运动”。随后,日本在沪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他们表示:“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②同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倒打一耙,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中方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要求。1月24日,日本驻沪特务放火焚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以图玩弄贼喊捉贼故伎,进一步扩大事态。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1月28日下午6时之前对日方1月20日提出的无理要求作出答复,并增加了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等无理要求。

日本特务、军国主义分子在上海不断滋闹事端的同时,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迅即增兵上海。截止1月27日,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为战舰30余艘,包括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分属第1外遣舰队,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8页,第369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8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第1水雷战队、第15、第22、第23、第30驱逐舰队6支日本特遣舰队；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包括暂停泊于黄浦江面的）6000余人。^①1月28日下午3时，南京政府屈从于日本压力，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函复日本村井总领事，表示完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但由于日本的真实意图是挑起战争，所以虽然南京政府已经屈让，日方仍步步紧逼，并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

1月28日晚8时30分，日本海军在沪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以声明形式发出新的通牒，要求中国撤走驻守闸北军队，撤除所谓“敌对设施”（即中国军队的设施和防御工事）。11时30分，当通牒尚未正式递交给中国方面之际，盐泽即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按预定计划进攻闸北。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出动2000余人，对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就此发生。

通过寻衅，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是日本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说，即使闸北中国驻军在盐泽通牒发表之后到日军开始进攻之前撤退，这在时间上也是不可能的。^②1月26日，日本内阁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就有恃无恐地表示：“陆军在满洲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1月28日下午，盐泽幸一在会见《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时也毫不忌讳地称：即使今天中国接受村井总领事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保护那里的6000名日本侨民而派遣海军陆战队。他还狂妄地对阿本德说：“正如你所知的那样，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9～370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5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务。”^①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推动及影响下,19路军全军上下斗志昂扬,希冀以实际行动汇入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浪潮。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回忆:“第19路军驻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在日本于上海恣意寻衅之际,1月23日,19路军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内容)。参加会议的军官均表示,一旦日军进攻,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下午7时,军部根据会议决定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警惕日军进犯,保卫上海及其具体部署的密令。^②24日,蔡廷锴等致电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等:“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③正由于有这样的准备,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直犯闸北19路军翁照垣部时,翁部即按密令部署,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了。

日军初犯遭痛击后,又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各路口,亦被击退。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于当日星夜步行经北新泾至真如车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后移至南翔)。^④29日晨,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5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龙华蔡廷锴戴戟来电》,载《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三),第21页。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页,116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后,继续进攻,被重创后溃逃。同日晨,19路军通电全国,申明抗战大义与决心;并陆续将其所属第78师、第60师、第61师布防到位,沿龙华、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浏河一线展开。

开战后一周内,战争始终被控制在闸北,日军未取得丝毫进展。2月4日,日军在新增兵力计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航母2艘并海军陆战队5千余人的基础上,^①沿闸北、江湾、吴淞一线发起第一次总攻。19路军与之激战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此次总攻。曾狂妄扬言:“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结束”的日军司令官盐泽被撤职调回,其职务由新增派的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本想在上海大出风头的日本海军,在参谋本部与日本内阁的协调下,与陆军达成了联合出兵的计划。^②陆军决定派遣第9师团增援海军。2月7日,第9师团开始于吴淞口陆续登陆、集结。野村因迂迴吴淞计划实施不利亦被撤职。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职务,指挥地面战斗;野村负责海上指挥与增援。2月11日,日军在飞机、重炮的猛袭后,集中兵力于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发动了第二次总攻。中国守军同仇敌忾、猛烈抗击,直至与敌短兵相接,白刃肉搏,血战7小时,胜利粉碎了日军的第二次总攻。

19路军的英勇抗战,不仅令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也极大地影响、教育了中国军队中的许多爱国军人。2月初,张治中将军于浦口对蒋介石面陈抗日主张,并表示了愿统兵抗日的决心,蒋同意之,并要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安排。^③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0日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页、第116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9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页、195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晚,陆军第87师第261旅的30余名军官,在旅长宋希濂将军的率领下,直闯军政部长何应钦住宅,面陈何应钦请缨抗战。^①在广大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下,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发布命令,由陆军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第1炮兵独立团山炮营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②次日,军政部命令第5军增援第19路军。为避免日军借机扩大战争,中方没有公开第5军增援的消息,并明确“第5军暂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以19路军名义抗战”。第5军随即出发(87师已于14日行抵上海)。^③第5军抵达上海后,即接防了江湾以北,经庙行至浏河一线。2月18日,全军接防完毕,进入前沿阵地。

2月18日,植田蚩横通牒蔡廷锴,要其率19路军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蔡廷锴与蒋光鼐立即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大家均气愤至极。指挥部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猛轰日军阵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2月20日晨,植田指挥日军沿闸北与吴淞之间的江湾—庙行一线发起第三次总攻,19路军及第5军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并从两翼迂回敌军侧后,对进攻之敌渐成包围态势,迫敌逃窜。25日,我军再战再捷,粉碎日军对庙行的又一次重点进攻。同期,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敌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日军第三次总攻计划彻底破产。此役使日军第9师团及其强悍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受到重大伤亡,庙行—江湾间敌军陈尸遍地。第9师团部分散兵逃至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急欲觅船返日,极其狼狈。南京统帅部致电嘉奖19路军:“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页、195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页。

③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615、1623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莫不称颂我军英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①

在日军屡遭败绩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于2月22日向日军中央本部发出急电:“目下当务之急是以足够的陆军兵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岂止战局僵持不下,纵使一日之迟延亦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区之敌的抵抗相当顽强,在此情况下,迅速增援大量兵力非常必要。增援部队还应尽量由军舰火速运送,登陆地点可在吴淞铁路栈桥。”^②23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增兵上海的提案。根据此提案,日军参谋本部立即成立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命曾为田中内阁陆相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副之,决定增派第11、第14两个师团赴淞沪参战。24日参谋本部将上述计划上奏天皇,即获天皇批准,尔后参谋本部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③27日,第11师团由日海军第2、第3舰队载运,离日出发,白川等乘坐第2舰队第4战队旗舰“妙高号”同往。

2月29日,植田遵白川令,集中第9师团兵力进攻闸北,企图突破一点,楔入我军阵地,然后向两翼扩大战果。我军与敌再度展开激战,仅八字桥阵地,我军即三失三得。我敢死队多次跃出战壕,短兵接敌,日军遗体累累,狼狈溃退,联队长林崛大佐亦被我击毙。同日,日军增援部队开始抵达,集结于长江口一线。

3月1日拂晓,日军在白川直接指挥下,发动第4次总攻。此时日军不仅装备优于我军,而且兵力总数也已多于我军,计有3个师团、第3舰队、第2舰队一部、海军陆战队等共10万余众。19路军与第5军齐装满员也只有5万余人,况且已经连日苦战,消耗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6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86页。

③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86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众多。日军以第11师团沿江湾—庙行—浏河一线展开攻势；以海军进攻吴淞；以第9师团进攻闸北，进迫真如、南翔我指挥部所在地，以第14师团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策应。此时，我军因1月抗战，牺牲甚众，已痛感兵力不足，即使如此，19路军和第5军全体将士仍誓死抵抗。同时致电军政部切盼增兵两师，驰援浏河，期望固守我军左翼，不被敌迂迴合围，则整个战局仍可支持并可有转机。但何应钦等迟迟不予理会。^① 19路军及第5军后援无望，陷入孤军血战。3月1日上午，敌第11师团以优势兵力在浏河一线七丫口段登陆，开始楔入我浏河防线。中国守军与敌激战整整一天，某些地段已到“无兵可战地步”，为防止日军两翼迂回我侧背合围中国守军，3月1日晚上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总部下达了撤退命令。^② 中国守军于当晚开始撤至嘉定、黄渡一线退守待援。3月2日，19路军向全国发出了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守待援的通电，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淞沪抗战，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援。抗战伊始，上海各界人民立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凡前线急需之物，上海各界民众均源源不断送至军中，并协助挖掘战壕、构筑工事。1月2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上海所有日资企业及在日本驻沪机构和日人住宅内工作、服务的中国同胞立即响应，使日本在沪企业、机构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等赴真如慰问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之内筹设了几十个战地医院和救护站。何香凝见天气寒冷而我官兵仅有单、夹衣各一套，立即返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0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0页、188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 3 万余套运送全体官兵御寒。^① 上海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各种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通信队、情报队等等,或直接参战或开展各类战地服务工作,英勇壮举层出不穷,可歌可泣。汽车司机胡阿毛自沉满载日军军火的汽车于黄浦江中,与敌军火同归于尽,令民众感而奋之。复旦大学、东北冯庸大学及华北若干院校的数百名学生,赴 19 路军中请缨参战,积极帮助 19 路军做了许多战地后援及服务、宣传工作。南京、苏北、广州、四川、安徽、湖南、无锡、嘉兴等地民众,组织了义勇军赴淞沪参战,承担了大量后勤支援性工作。据统计,在淞沪抗战期间,海内外同胞捐款支援 19 路军达 700 多万元。^②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并号召人民掌握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警惕国民党军阀的出卖。^③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奋勇抗击日军月余,使其四易主帅,死伤累万,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二、《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在华权益最集中的地区,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1 月 29 日,英、美、法等国即出面调停,要求停战。日本政府一则尚不能与西方列强全面对抗;二则从中国军队的抵抗中感到亦不具全面侵华实力;三则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121 页。

②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 383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 496、497 页。

其真实意图本来就在于胁迫南京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承认既成事实并取缔国内抗日救国运动,所以在2月23日决定增兵上海的内阁会议上,同时要求日军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

由于英美的一再斡旋调停,2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外交部长罗文干的私人代表)、黄强(19路军参谋长)与日本代表野村、松冈洋佑(日本外相芳泽的私人代表)在英国驻沪舰队旗舰“肯特号”上进行了会晤。2月29日,中国方面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英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克利,对日方提出了停战原则:(1)中日两军同时撤退;(2)不应涉及将吴淞口和狮子林要塞永远解除武装的问题;(3)为监督两军撤退,应组织有中立国观察员参加的联合委员会;(4)撤退区域应由中国政府统治,使用中国警察;(5)中国军队撤至真如,日军即应撤回租界和越界马路;其后,中国军队撤至南翔。日军舰只的撤回问题,拟在下次会议上提出。^①当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屡遭败绩,未取得任何进展,不愿以战败者身份谈判签约,希望以战胜者姿态进行停战交涉;加之日军增援部队正抵沪集结,计划好的第4次总攻已经启动,所以交涉未果即中断。3月1日夜,19路军及第5军开始后撤,西方列强再次要求停战,白川迫于压力,也下达了停战命令。3月4日,国联作出要求中日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的决议,并要求在上海租界有着特殊利益的第三国给予援助。中日两国对此均表同意。^②继而,在英、美、法、意四国的参预下,组成了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3月19日,联委会6方签定了停战基本协定。3月24日,中日停战谈判在沪正式开始。中方代表为南京政府副外长郭泰祺及戴戟、黄强等,日方代表为重光葵、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8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9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岛田繁太郎少将等。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意大利驻华代办齐亚诺等出席了谈判会议。中日双方围绕日军撤退区域及时间、中国军队驻防区域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谈判一度曾有破裂之危险。4月11日,中国方面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召开国联特别委员会裁决;并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将谈判地点移至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此后,中国在日本撤军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与妥协。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5月5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上海及周围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中日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警察接管;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区,不再前进;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驻地即公共租界与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域等。^① 依据这一协定及其附件(主要为限制中国军队驻防区域的细则)的决定,中国军队今后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驻防;日军却可以留驻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即跨(各国)租界马路区域。这既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又为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前沿阵地。日方资料揭示:“签署协定后,中国方面即使要求只让自己军队在限制驻兵的区域通过一下,也作为是违反协定,每次都受到日本方面的抗议。”1934年3月27日两国又进行了换文,中国只好同意:“今后我军通过上述区域时,一定事先通知日本方面。”^② 中国军队淞沪浴血,最终得到如此屈辱之结局,张治中将军称之为“沉痛的收场”。以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西方列强主观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但客观上有利

①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25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0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于反对日本扩大侵华的外交政策,南京政府若决心抗战到底,增兵驰援,淞沪抗战极有可能大获全胜,并使日本今后不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导致以上结局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南京政府执行了不抵抗政策。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虽然宣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①迁政府于洛阳,以示抗战决心;同意 19 路军抗战,命令第 5 军增援。但本质上缺乏抗战的勇气,没有取胜的信心。1 月 30 日,迁国民政府于洛阳时,民众对其有仓惶出逃之感。当晚,宋希濂等向何应钦请战时,何表示,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之一,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各方面都很落后,怎能同日本人打呢?^②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何应钦又迭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2 月 13 日,蒋介石亲至浦镇,“指示沪事”,竟提出:“以 19 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③这表明,南京政府的抗战行为,乃因日军侵略其中枢地区不得已而为之,勉强而为之。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南京政府此期抗战并非目的,仅为手段。因此,南京政府从抗战一开始即限制之。2 月 5 日,何应钦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④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⑤驻扎上海的中国海军,竟与日本海军达成“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的协议,^⑥坐视日本海军攻击中国

①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 391 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195 页。

③ 《中华民国史纲》,第 383 页。

④ 《中华民国史纲》,第 383 页。

⑤ 《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47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版。

⑥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132 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地面部队。2月23日,19路军已感兵力不支,黄强参谋长面见蒋介石,涕泣求援,蒋推托道:“各部队俱未集中,何以增援。”后迫于压力,蒋答应令上官云相第1师和戴岳独立旅驰援19路军及第5军。但迟至2月27日,上官部仅以两营开到黄渡,其所属各部“仍奉命留驻镇江、无锡、苏州”。戴旅则一直在杭州不动。^①

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仍为其“先安内,后攘外”之决策。黄慕松接着上述的解释说:“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果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②当时,驻于苏、浙、皖、赣、闽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达60个师,但因布置于“剿赤”,竟不分一兵一卒支援上海。^③主要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利己原则下调停所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虽然使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侵占上海,但却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使上海仍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控制之下。

三、日本侵华后世界各大国的对华对日政策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入侵,不仅践踏国际准则,破坏世界和平,而且也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和所确立的“利益均沾”的原则,所以事变一发生,各国均做出了反应。因为各国的处境及在华利益不同,各国对华对日政策则参差不一。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进一步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

① 《中国现代史稿》,第391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3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使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①但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支持基本上停留在声援上。由于苏联正忙于国内的工业化;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一直放在防范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上,警惕它们将日本这股祸水由满蒙北引,加之联共(布)党内矛盾正在逐步激化,苏联政府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立场,未对中国予以有力支持,亦未对日本进行有效制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产生了重大利益冲突。其实质是:美国想凭借经济实力,通过实行门户开放政策,逐步过渡到在实质上独占该地区。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的日本,则想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太平洋区域国家所拥有的相对经济、军事优势,抢先一步,以武力吞并该地区,最终拒美国于门外。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让步,暂时协调了这个矛盾。但日本扩张企图仍存,美国对日本在该地区的举动亦极为关切。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客观上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严重挑战。9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委婉指出满洲事态的责任在日本方面。同时,史汀生三次打电话给英国外相西蒙,想与英国商讨办法,联合对付日本。^②但英国毫无确切表示,美国由此不敢单独行动。10月8日,日军空袭锦州,南犯意图显露,美英法惧怕日本入侵关内,严重损害其在华利益,遂对日本进行了交涉。10月9日,史汀生在美国总统胡佛召集的会议上指出,美国限制日本的所有条约成了一堆废纸,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认为经济制裁可能导致

^① 《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② 《中国现代史稿》,第389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美日战争,美国地理位置不利,又无英法支持,美国尚未作任何战争准备,不同意实行之,仅同意进行外交交涉。11月23日,史汀生命令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通知日本政府,若日本进攻锦州,美国政府的忍耐即达到了限度,并将使目前在巴黎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破裂。^①但由于美国的行动也仅停留在外交压力上,致使日本无所顾忌。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1月7日,史汀生代表美国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力——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全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即国际争端不诉诸于武力解决的非战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②此即所谓“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恢复帝国主义各国共同控制整个中国的局面;但在客观上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承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及东北为中国的主权范围,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美日利益客观上严重冲突,美国因此具有制裁日本的客观压力与主观要求。但综观美国此期外交政策,除对日外交措辞渐次严厉外,在具体行动上亦无所作为,甚至软弱无力,当然更谈不到有力地支持中国,致使日本有恃无恐。

华盛顿会议后,英日联盟解体,但英国仍与日本维系着若明若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37页。

② 《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下卷,第375页,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版。

暗的伙伴关系。以此为基础,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奉行了一种三重性对日政策:当英国在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利益受到或有可能受到日本侵害时,则与日本展开争夺,并借助于美国共同制约日本;同时,英国目睹美国的崛起,为确保其在中国及远东地区的权益,英国常暗中或从侧面支持日本,以抗衡美国;英国一直惧怕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积极支持日本控制满蒙地区,特别是在北满地区,以威胁苏联后方,并遏止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南下输出。本此政策,英国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极其圆滑狡诈并听之任之的态度。英国副外相艾登则明确表示:“中日关于东北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国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某位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国最好保持一个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① 只有当日本南犯锦州、辽西,威逼关内,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时,英国才愿与美国一道采取较强硬姿态,但也仅仅停留在这种姿态上。另一个欧洲大国法国出于维护自己在中国及远东权益的需要和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视,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与英国基本一致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仍出售了大量军火给日本,法国甚至还给了日本8亿法郎的贷款。由英法对日政策所决定,英法控制的国联对日本侵华也一再妥协退让,致使南京政府希望通过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破灭。

综观日本侵华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采取的政策,实质上已形成了美英法集团早期的绥靖政策,中国则成了这个政策的最早牺牲品。早期绥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矛盾交织演化的结果,也是30年代经济大危机使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产物,还是英法遏止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手段。日本则利用这些矛盾,实现了其既定计划。日本侵占东北得手后,肆无忌惮地挑起一二八

^① 《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6页。

事变,西方列强初尝姑息养奸之恶果,共同采取了调停行动。

四、国联调查团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一切依赖国联的方针。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基本上被英、法、日、意几个大国控制。9月21日,蒋介石谈话称,东北事变应“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①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并建议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日本由于作贼心虚,惧怕真相大白于天下,坚决反对。9月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东北事变,英法操纵下的国联竟听信日方的诬告,对中日双方提出了“不扩大事态,同时撤兵”的相同警告。

此后,日本的侵略意图暴露无遗,在中国的一再努力下,国联在9月30日终于作出了“限定日本于10月14日撤兵”的决议。10月24日,又作出了要求日本11月16日前撤兵的决议,但日本置若罔闻,毫无顾忌,反而一步步地吞并了整个东北。国联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并未表现出中国当局所希望的“公理”、“正义”,它的一次次决议,全都成了一纸空文。

中国代表在国联各种场合一再要求组织国际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事变真相,制裁日本侵略。1931年年底,日本已北犯黑龙江,占领了齐齐哈尔,为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并自信可利用其在东北的入侵者地位左右调查,也转而同意此举。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国际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组成。其成员包括:英国

^①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43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曾任印度代理总督的李顿伯爵、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中将、法国前任安南(越南)驻军司令官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博士、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李顿任团长。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和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也参加调查团工作。

调查团组成后,并未立即赴中国实地考察,而是先绕道去会晤了英法美日等国政府要员,于3月14日到达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调查,7月20日于北平开始起草报告书。调查团到中国后,会见了中国政府首脑,在东北先后会见了伪满洲国的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日军多方干扰调查团的调查活动。限制调查团内的惟一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活动,甚至不让他与日军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①即使如此,东北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途径,仍向调查团递交了揭露日本侵略的书信函件1500余件,陈述事变前后所见之事实。9月4日,国联调查团基本完成了报告书,经修改和国联审议后,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中国首都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三地,同时正式公布。

《李顿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伪满洲国的状况,作了基本符合事实的具体陈述。它首先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乃日本的阴谋。《报告书》指出:“依据调查团所得种种确切之说明,则可知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1931年9月18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中国方面依照其所奉训令并无进击日军,亦无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危害日侨生命财产之计划。”“9月18日晚是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②接着,《报告书》强调东北是中国领土,属中国主权范围。《报告书》指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4页。

② 以下内容均引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载《革命文献》第40辑。

出：“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中，满洲仍完全为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告独立，事实俱在。”进而，《报告书》揭露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指出日军“在每次占领之后，即将该处行政机关改组。由此可知在1931年9月以前，满洲毫未闻有独立运动，其所以有此运动者，乃日本军队在场所致也。”“本调查团认为‘满洲国’之构成，虽有若干助成分子，但其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之军队官吏之活动，盖以本调查团之判断，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关于该‘政府’其各部名义上之领袖，虽系居住满洲之中国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权，则仍操诸日本官员及日人顾问之手。”“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但《李顿报告书》同时又明显表现出偏袒日本、维护帝国主义共同利益的倾向并诬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日争端问题上，《报告书》多次为日本辩解，称“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支持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应负责任”。中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办法禁止并遏抑有组织之抵制日货运动”。进而并诬称“近年来苏俄在外蒙古势力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均使日本忧虑，日益加增”，此为“中国及事变之‘患源’”。《报告书》竭力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表示“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肯定“日本在满洲之权力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凡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报告书》荒谬地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通过国联）共同管理东北的主张。《报告书》提议，东北的政治行政组织，既不能恢复1931年9月以前的原状，亦不应继续维持伪满洲国，而应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建立“应获得高度之自治权”的新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的东北地方政府。东北应建立顾问会议制度,顾问由国联理事会提名,由中日两方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组成。根据顾问会议决议,再建立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外国顾问应存在于东北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各部门,并担任东北中央银行顾问。“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中日两国军队均退出东北。

《李顿报告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肯定东北属于中国不可变更的领土及主权范围;暴露了伪满洲国的实质,对之采取不承认主义,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利于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对日本的进一步侵华军事行动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李顿报告书》的主观目的决非为了中国。它提出的种种所谓解决办法,仅是企图在不太得罪日本的前提下,将中国东北纳入帝国主义共同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李顿报告书》是西方列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作的修补与维护,是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要求共管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矛盾的产物,它与西方列强对“一二八”的外交调停的逻辑是一致的。《李顿报告书》仇视共产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显示了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因而《李顿报告书》发表后,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也受到国际上主持正义人士的批评。

1932年12月12日,国联专门组织了一个有部分中小国家参加的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赋予其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任务。1933年初,该报告书完成。文件中坚持了不应侵犯国家领土主权、满洲领土及主权属于中国、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不给予伪满洲国以承认等重要观点。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对1票(日本)通过该报告书。史汀生随即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赞同。南京政府也表示原则上接

受。但日本政府竟于3月27日声称,国联特别大会通过的报告书,“以九一八事件当时及其后日军之行动,独断为非自卫权之发动”,“漠视‘满洲国’成立之真相,而否认帝国承认该国之立场”,^①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第二节 东北人民继续抗日作战

一、伪“满洲国”的成立

早在日本军部密谋军事侵占东北的同时,就拟定了发动战争后“收拾时局的最初计划”。日本参谋本部在1931年4月制定的《情势判断》文件中,对解决满蒙问题提出了三阶段方案。三阶段方案在内容上各自完整、系统,实质上构成了三种独立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所谓“努力改变我根据条约或契约而正当取得之权益因中国方面的背信弃义而被损害的现状,确保我权益之实际效果并进行扩大这一权益”。“这样预期建立的满洲政权将是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仍把它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种方案“是在满蒙组成一个政权,这一政权所拥有的权益,比过去合法取得的权益更多,并将其从中国中央政府中独立出来,也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种方案就是“以武力直接占领满蒙,将其并入日本版图”。^②

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关东军板垣和石原两参谋等人便会见了正在奉天(沈阳)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板垣、石原

① 韦罗贝著,薛寿衡译:《中日纠纷与国联》,第56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版。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57页,第262页。

等力主采用第三种方案收拾时局,建川主张采用第一种方案。双方激烈争论了数小时,建川对关东军作了妥协,表示“对军队的积极行动不加阻碍”。^①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在9月20日、21日致关东军的电报中,否定了板垣、石原的意见。建川美次于是重新提出:“推翻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②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在本庄繁授意下将板垣、石原、土肥原贤二、片仓等人召集在一起,专门就此事进行协商。会议综合建川与土肥原意见,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该政策案提出:“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这个政权的“国防、外交以新政权委托之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总之,这是一个建立亲日政权后由日本掌握国防和外交的方案,其设想是想将该政权引导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③在《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中,日军还提出了勾结、利用民族败类熙洽、张海鹏、于芷山、张景惠以及时任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的具体计划。^④日本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同意了这一方案。10月6日,在三宅、板垣、石原等拟定的一份文件中,将这一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为“三条根本原则”,即:“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上述新政权在实质上最终要置于我国的保护之下。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⑤11月17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木侠和本庄繁、板垣、石原等进一步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2页。

② 《现代史资料(下)满洲事变》,第187页。

③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7页,第407页。

④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7页,第407页。

⑤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18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交换意见后,起草了《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明确提出:“将满蒙作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为上策,但鉴于以往的情况,目前突然采取这一步骤将徒然引起国际上的议论。作为中策,建设满蒙独立国,使其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统治。”^①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东北地区的县、省各级伪政权,然后以此为基础,拼凑伪“满洲国”。在《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中,日军提出了“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手段(途径)——建立国家的作用,在于完成下层政治机关即县市自治的同时;确立上层机关即省一级的独立,并逐步谋求确立中央政权,组织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中央政府之政府”。^②按《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的既定计划,关东军指派板垣等人分别去做拉拢引诱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等的工作,促使其公开投日降敌。同时,通过日本驻天津部队司令官,将溥仪及其亲信罗振玉、徐良等人“保护”了起来。^③企图复辟清王朝的封建遗孽和中华民族的败类,纷纷附逆为奸。

在日本的一手炮制下,东北各地的伪政权开始出笼。1931年9月24日,辽宁成立了“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于仲汉、阙朝玺为“副委员长”。9月27日,原“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组织“东省特别行政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当局又指使组成了“辽宁四民(商、工、农、学)临时维持会”,以前清王朝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1月19日,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指使李维周等于该地成立了“地方维持会”。接着,各省伪政权先后成立。9月26日,前清遗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3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4页,第407页。

③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4页,第407页。

肇、降日民族败类熙洽合并吉林省原军、政两机关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吉林省长官”，声明同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东北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成立了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11月7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沈阳的原“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被改组为“奉天省临时政府”，11月15日，又正式改组为“奉天省政府”，以臧式毅为伪省长。伪省政府随即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秉承日军意图发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所谓“独立宣言”，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6日张景惠就任伪省府主席。

同期，关东军特务机构头目土肥原贤二南下天津，诱迫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北上东北。此前，日本方面准确估计了溥仪的复辟愿望，判断溥仪同蒋介石、张学良等均不能合作，而“可以同日本合作”，^① 因此可以利用其家族与东北的联系，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溥仪退位后，居于天津日本租界内。土肥原到津后，面见溥仪，迎合溥仪的复辟愿望，声称日本可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起初半信半疑，最终被复辟欲所驱使，同意与土肥原及日本合作，但又虑于民众及社会舆论，一度陷入两难境地。11月7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袭击天津公安局保安队，制造暴乱假象。^② 溥仪遂以此为烟幕及借口，在驻天津日军护送下，“半强制半自动地逃出天津”，由塘沽乘日船“淡路丸”前往东北，13日上午抵营口。到营口后，溥仪为欺骗社会舆论，对日本官方说，由于天津发生暴乱，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为寻求安身之处而逃出天津，要求取得保护。于是日本方面按预订计划，宣布出于“人道方面的考

①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96页。

②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6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虑”，给予溥仪以“保护”。^① 11月16日，日本陆相南次郎（12月13日由荒木贞夫接替）电示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待和中央联系后处理”。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运往旅顺，“等待建新国时机之成熟”。^②

在东北省级伪政权均已成立的基础上，日本内阁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于1932年1月6日，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强调：“关于满蒙，确定在帝国的威力下，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方面，使之成为帝国的永远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满蒙目前是独立于中国本部政权之外的另一政权的统治区域，逐步引导其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形态。为此目的，要求迅速确立和稳定满蒙各省政权，比以往更积极地加以援助。使建立的各省政权逐步做到联省合并，并相机宣布建立新的统一政权。”^③ 按此“纲要”精神，1月22日，三宅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研究了成立伪满洲国的步骤和计划。27日，关东军拟定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决定“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主要首脑，先组成政务委员会，负责建立新国家的研究准备工作”。

此时，李顿调查团已正式组成，日本为造成既定事实迫其承认，加快了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2月16日，日军召集各省伪政权头目于沈阳，召开了联省会议，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凌升、齐玉、汤玉麟、马占山^④为“委员”。该“委员会”宣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⑤ 22日，板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会谈，要其出任伪

①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7、438页。

② 《现代史资料（下）满洲事变》第437、438页。

③ 《满洲事变》，第440、441页。

④ 哈尔滨沦陷后，马占山一度被敌伪诱降，后又起兵反日，战败后至苏联再辗转赴沪。

⑤ 《中华民国史纲》，第389页。

“满洲国”“执政”。2月2日至24日,三宅、板垣、石原等连续与各省伪政权头目举行会议,确定成立伪“满洲国”的各项具体事宜。25日,经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意,东北伪政权正式采用“满洲国”名称,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所谓“新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同时,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所谓“建国通电”,声称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内蒙古之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属其版图范围。^①3月1日,日军指使伪满政权发布所谓“建国宣言”。溥仪虽一心想复辟“大清皇朝”,要当“皇帝”,但在日本胁迫下,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在长春举行了所谓“就职典礼”。^②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汤玉麟副之;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日本人驹井德三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掌握各部一切实权,凡有命令及决定,不经该厅签字盖章,即不能执行。“各伪机关实权,则皆操诸所谓顾问谘议之手”,而“顾问”、“谘议”及各部门副职及中层各职,均有大批日本人充任。^③

对日本一手制造傀儡政权的行径,中国政府一再加以谴责,并声明不予承认。1932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针对日本策动的“独立运动”郑重声明:“凡东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离或独立,与夫东三省内之一切行政组织,未经国民政府授权或同意者,一律否认之。”^④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要求世界各国不予承认。

① 《满洲事变》,第442页。

② 《我的前半生》,第313页。

③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一)》,第4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年台北出版。

④ 《外交部对东三省所谓独立运动的宣言》,载《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19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满洲国领域内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概应确认尊重之”。“日本国军队,应驻扎于满洲国内”。^①东北终于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改年号为“康德”。这个傀儡政权存在了14年,194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失败而垮台。

二、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满蒙地区仅是其进一步入侵中国,进而占领亚洲、争霸世界的前进基地。基于此,掠夺满蒙地区丰富的资源,壮大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是日本侵吞东北的首要目的。为贯彻此目的,日本运用军事、政治、文化手段,对东北实行野蛮、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和军部规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是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最高长官,事实上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对于满洲国政府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现”。^②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的形式,对东北实施直接殖民统治。

为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陆续派往东北的部队计有步兵第14混成旅团,第20师团、第6师团、第8师团、第10师团、第14师团,骑兵第1旅团、第4旅团、第10、第11、第12飞行大队。凭借重兵,日军在

^① 《日满议定书》,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一)》,第106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选编》,第65、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伪军配合下,疯狂“讨伐”东北各地,杀害人民群众。仅1933年9月,日军对抚顺附近平顶山村的一次“讨伐”,就烧毁房屋800多间,惨杀居民3000余人。日本占领当局还大力兴建并强化宪兵队、警察局、法院、监狱等机构。伪“满洲国”警务司长、各省警务厅长、各县警察局长、各区警察所长也都由日本人担任。各县并设有直接由日军指挥的保安队。1933年5月,日本占领当局又决定在各村庄设立警察,办理所谓“乡村警察事务”。日军宪警在东北城乡横行无忌、滥杀无辜,制造殖民恐怖。从伪“满洲国”成立到1934年两年间,日伪以“反满抗日”的所谓“罪名”杀害民众多达67000余人。^①日军还全面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威逼民众对“反满抗日者”进行“大检举”。为对付抗日武装,日军还强暴实施了保甲制度和“归屯并户”政策,蓄意制造无人区。并大量征发民工修筑直接联接日军基地和靠近抗日游击区的所谓“警备路”,禁止民众通行,以便日军行动。在日军的直接指使控制下,成立了以汉奸为主体的所谓“正义团”,专事收缴民间武器和镇压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

日军当局惧怕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解放斗争,遂在东北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华民族文化。伪“满洲国”成立后,所有中国教育机构或被关闭,或由日军监视改组。强迫学生一律学习日文,向学生灌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原来所用之中文教科书,悉数改换;对历史事实,刻意篡改,以“合日本之意”。日军当局还驻兵学校,防范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随时销毁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书刊。仅1932年3月至7月,即焚书650万册,并随意对学校进行“整肃”,捕杀爱国

^① 《中华民国史纲》,第390页。

师生。^①

以恐怖统治为基础,日军当局疯狂掠夺东北资源,统制东北经济。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下,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经济轨道。1932年8月5日,日本公布《满洲经济统治根本方策案》,提出了“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纲领,并规定关东军和“满铁”为统制伪“满洲国”经济的支配机构。1933年3月1日,伪“满洲国”公布由关东军和“满铁”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宣布对东北经济实行统制,并使之统一于所谓“东亚经济”之中。《纲要》规定,凡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均由“满铁”一类的日资公司或名义上为日满合资实质仍是日资为主的一类公司垄断经营,此类公司称之为“特殊公司”或“国策公司”。这类事业达46种。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业仅有20种,规定可由民间自由经营。但日本根据一业一公司原则,在其他各业均设立了占支配地位的垄断性公司。^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先后设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等许多垄断公司,统治了东北的采煤业、石油勘探及开采业、汽车制造业、电力事业、化工工业、炼钢业、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业、林业、盐业、通信事业、广播事业等等。1932年7月、8月间,日本又连续与伪满签订了交通、航空、采矿三个协定,随即成立了垄断性公司,统治了东北的交通、航空和采矿业。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公司达369个,遍及一切经济领域。实际资本额为52200万日元,其中垄断性公司的资本达36900万日元,占71%。^③日本垄断公司操纵了伪满的整个经济命脉,使东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致

①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402页。

②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5页,解放社1939年版。

③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8页,解放社1939年版。

第一編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使日本掠夺了东北大量资源。1936年,东北输往日本的农矿产品和各种原材料,占其对日输出总额的79%,比1932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同期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个人消费品占60%以上,并且都是日方人为规定的高附加值产品。^①这种不等价不合理交换,使东北由中国惟一的外贸出超地区,自1933年起,变成了入超地区,海关管理也完全由日本控制。东北地区外贸状况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东北经济的殖民地性质。

在商业方面,日本使用军事及行政手段打击东北地方商业并限制外商活动。日本为垄断东北商业,排斥外国商业资本,迫使其纷纷从东北撤出。对从关内运往东北的中国商品,竟征收高达40%的“关税”,绸缎、茶叶、瓷器等中国土特产品,还加倍征税,以致国货在东北市场逐渐绝迹。而对日本输入东北的货物,仅征4.5%~11.5%的关税。^②从而使日货在东北进口货物总值中的比重,由20年代末期的60%上下,增至30年代的75%以上。^③东北逐渐成为日本的独占市场。

在金融方面,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掠夺其库存黄金8万公斤。此后,又相继占领了边业银行、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三大金融机构。1932年2月5日,关东军与“满铁”制定了《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要纲》。3月中旬,正式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设立伪满洲国“中央银行”。随后,集中了四行号的发行准备金,统一纸币发行权;接着,进行了所谓“币制改革”,发行殖民地货币(满元)。

①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76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③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第247页,上海社科院1948年版。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日本占领当局一方面规定伪币对旧奉票的高兑换率,打很大的折扣强制兑换旧奉票,掠夺人民资财;另一方面将伪币与日元挂钩,实行所谓“日满货币一元化”原则。由此,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的货币与金融。^①

在农业方面,日本首先运用军事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向东北大量移民,掠夺东北农民耕地。1932年4月,伪“满洲国”秉承日本之意,颁布《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可在东北获得土地的承租权。1933年6月,日伪又颁布了土地的《商租权登记法》,规定日本人可自由商租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土地,一次租用土地的期限为30年,期满可续租延长,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人对商租土地的永久占有。1935年12月,日军与伪满政权设立了“满洲拓殖会社”,作为专事移民的机构。1936年3月,又设立了“地籍整理局”,着手通过所谓地籍整理掠夺土地,安置日籍移民。1932~1937年间,日本先后5次向东北进行武装移民,抢占了农民耕地20余万垧。1936年7月以前移入东北的日本人已达71万余人、朝鲜人85万余人。^②日本掠夺的土地,集中于松花江下游、辽河下游、牡丹江流域等东北的富庶地区。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被强迫“归屯并户”。其次,日军当局强迫中国农民种植罂粟,并于1932年11月设立“鸦片专卖局”,公卖专卖鸦片,以支撑因军费庞大而日益困难的财政。1935年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县达35个,种植面积达166.5万亩。^③第三,统制粮棉。为将东北变成日本的粮棉供给基地,用暴力强迫农民种植专门输往日本的稻米、小麦、高粱、棉花及一些杂粮,然后由满洲粮业会

① 史金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2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09页,三联书店版。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24页,三联书店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社、满洲棉花会社等垄断公司低价收购,运往日本。1932~1936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高粱、小米分别占东北总产量的40%和90%以上。^①日伪还在春荒时,将低价强购的粮食高价出售,牟取垄断暴利。第四,统制经济作物,其手法与统制粮棉类似。如1934年6月设立满洲亚麻株式会社,强行低价统购亚麻,并统制亚麻的加工与纺织。还用低价强迫统购大豆等,致使1934年东北大豆每斤(500克)价格,竟比九一八事变前下跌了55%以上。农民每种一垧地大豆,就得倒贴10~15元。^②第五,统制畜产,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在各县设立了“马政局”,调查民间所有的马数,并将马分为军马和耕马,凡被认为可充作军用之马,一律送交“马政局”征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每年要花费相当于1亿日元的外汇,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以满足本国毛纺织业所需。侵占东北后,日本要求伪“满洲国”在10年内满足日本对羊毛的需求,为此,专设了“满洲绵羊协会”,统购东北羊毛,禁止任何个人买卖。第六,统制林业。1936年,日本设立了林业垄断组织——满洲林业会社,在东北东部和东北部划定森林区域,垄断林业的采伐、运输和销售,排斥私营商行。日本对东北农业的统制使东北农产品价格出现极度反常的状况,以1931年的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为100,至1933年,竟下降为高粱50.92,小米51.26,玉蜀黍49.83,大豆60.51,几乎都下降了一半。^③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价格如此低落,充分展现了日军当局对东北人民榨取的程度。这种垄断低价的形成,决非凭借由竞争导致的优势经济地位——垄断的形成而形成,它完全源于日本殖民当局依靠军事暴力手段、运用行政指令方式人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8页,三联书店版。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2页,三联书店版。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3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为制造的强制性垄断,其本质是超经济性的。因此,这种垄断低价仅表现了东北经济服从于日本利益的殖民地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全面殖民统治,使东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部分东北军和东北义勇军开始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战,历时岁余,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宣战的通电,“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①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优秀干部赴东北,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初,中共中央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对即将赴东北各地去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共党员强调:“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指示信。指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总策略方针是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指示信强调要发展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要深入到一切反日武装中去,在进行下层统

① 《红旗周报》,第19期。

② 《星火燎原》(4),第379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开展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指示信精神,会议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定》,制定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信的计划 and 各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一切抗日军队签订作战协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等。

1932年~1933年间,东北建立了许多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包括:磐石游击队,1932年初由李红光、杨佐青(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等创建于吉林省磐石县。不久,与磐石赤卫队、海龙游击队汇合,同年11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队伍发展至800余人。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任游击队政治委员。1933年春夏,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活动于磐石、海龙、伊通、桦甸、通化、柳河等地。东满游击队,1933年1月由童长荣(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王德泰在原东满红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队伍很快发展到千余人,活动于吉林以东汪清、安图、和龙、珲春一带。珠河游击队,1933年10月由赵尚志、李启东、李兆麟等创建于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游击队联合了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等群众抗日武装,活动区域遍及延寿、阿城、双城、滨江等地。密山游击队,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由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地的群众抗日武装合并组建而成。1933年初,李延禄将溃散的王德林义勇军残部,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同年7月,中共密山县委将这两支队伍合并,仍称密山游击队,以李延禄为主要领导人,活动于密山、勃利、宝清、林口一带。宁安游击队,1932年由白殿贞、张建东等创建于宁安县,称“工农救国义勇军”,后与周保中领导的王德林义勇军残部会合,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此后,中国共产党又派陈翰章等整顿了队伍,改称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1932年秋,中共汤原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中心县委以当地的抗日救国会为基础组建。1933年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队,领导人为冯仲云、夏云阶等。当年冬,队伍即发展到了2000余人,活动于汤原、富锦、通河、依兰等地。饶河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县委即开始组织抗日救国会。1933年6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饶河游击队。领导人为李学福(葆满)、崔石泉等。活动于黑龙江省饶河、虎林、宝清、佳木斯等地。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由张甲洲、赵尚志等建立、领导。活动于黑龙江省巴彦、绥化、东兴一带,后在东兴作战中受挫溃散。此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还有:海伦游击队、和龙游击队、台(安)辽(中)游击队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述抗日游击队建立后,在武器装备低劣、环境险恶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英勇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磐石游击队于1933年1~4月,与敌苦战,周旋3个多月,连续粉碎了日伪的四次“讨伐”,创立了以玻璃河套和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又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攻克了磐石大兴川、伊通营城子等敌人重要据点。东满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度攻克东平县城和敌占八道沟据点,创立了以延吉的湾湾沟、八道沟、珲春的烟筒砬子、大荒沟、汪清的大小汪清以及和龙的渔浪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东满游击队与“讨伐”的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讨伐。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攻克珠河镇,直下黑龙宫,三次围攻宾州,并一度解放宾州城,全歼敌守军,威慑敌胆,创立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珠河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具有抗日临时政府性质的农民委员会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抗日救国组织;同期,还在庙岭伏击战中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缴获枪械200余支。密山游击队于1933年8月,奇袭扬木林子日军据点,击毙日军百余名。饶河游击队建立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度解放虎林县城,创立了以抱马顶子、大叶子沟为中心的游击根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根据地。汤原、密山、宁安等游击队,也在对日伪作战中,分别创立了以太平川、哈达河、八道河子等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9月至1935年底,各抗日游击队在对敌作战捷报频传、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3年9月18日,以磐石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3月,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以东满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王德泰任师长。1934年春,按中共满洲省委部署,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召集了该地区抗日武装领导人会议,成立了江南抗日军联合总指挥部,推选杨靖宇为总指挥。赵尚志在珠河召集了哈东一带抗日武装首领会议,成立了哈东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的基础上,1934年9月,杨靖宇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下辖两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在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春,王德泰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下辖3个师,王德泰任军长,在东满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1月,赵尚志部队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在以珠河为中心的哈东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秋,以密山游击队、饶河游击队为基础,联合该地区其他抗日武装(救国游击队等),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属东北人民革命军序列),李延禄任军长。在以密山、饶河为中心的周围各县从事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2月,以宁安游击队为基础,汇合当地的其他抗日武装(工农义勇队等),成立了东北反日军第5军(属东北人民革命军序列),周保中任军长,在以宁安县为中心的周围各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春末,汤原游击队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夏云阶任军长,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周边广阔

头目土肥原支持此计划,并与驻天津日军以及关东军共同阴谋策划了枪击天津日军兵营事件。1931年11月26日晚8时20分,土肥原唆使日本特务和部分伪装了的日本士兵从多角度射击日军天津兵营,造成其被围攻的假象。驻天津日军由此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接到其求援电报后,立即按照既定方针发布命令:“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急,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①但因日军蓄意扩大侵略的阴谋很快败露,加上当时日军尚未完全侵占锦州、辽西地区,此既定计划遭到日军陆军部的坚决反对,只好暂时中止。

1932年初,日军占领锦州、辽西地区后判断:“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长城一线,事实上已置于关东军的统治之下。”^②关东军取得了继续西侵的有利态势,“在这一点上,锦州之战多半包含着对关内作战这一转机”。^③日军还认为:“锦州之战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外,还有其打击张学良的政治目的。不过锦州只是张学良的前进据点,真正的根据地还在北平(当时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一旦锦州被占,张学良必然在北平加强反攻态势。所以,如果攻占锦州后不解决北平问题,那么满洲国的建设也难以期望太平无事。”^④据此逻辑,不占领全中国,日本就不会感到“太平无事”。这是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方案,它蕴含了扩大侵华的必然性。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背山临海,地形险峻,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关”之称。日军在拼凑了伪“满洲国”之后,

① 《满洲事变》,第339页。

② 《满洲事变》,第359页。

③ 《满洲事变》,第359页。

④ 《满洲事变》,第359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按既定的扩大侵华方针开始进迫山海关一线,很快占据了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外围地区,其海军游弋于山海关海面,舰炮可直射山海关。1932年12月8日,关东军铁甲车队炮击山海关,并提出了山海关中国驻军取缔民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一切支援,阻止东北义勇军将上撤至关内等无理要求。这自然遭到山海关中国驻军——东北军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的拒绝。日军因关内外驻军的协调尚未完成而未扩大事态,“但其蓄意侵占榆关的企图更为积极”。^①

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秦(秦皇岛)榆关(即山海关)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指使日军在其守备队兵营内自掷手榴弹和鸣枪射击,并袭击中国哨兵,然后诬称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兵营。鉴于形势紧急,何柱国在接到报告后,“星夜由北平回防”。^②

1月2日凌晨,日军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等四项要求,限即刻答复,“否则开始夺取”,^③遭何柱国断然拒绝。日军遂出动步兵3000余名、火炮40余门、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从东、南、东南三方向大举进犯山海关。东北军步兵独立第9旅驻守山海关的第626团第1营、第3营奋起抗击,^④与日军在山海关南门、东门、东南角楼一线展开血战,阻遏了日军的进攻。受挫的日军又出动飞机8架、军舰2艘增援,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中国守军坚守不退,顽强抵抗。日军的多次进

① 关邦杰:《榆关抗日战役与何柱国将军》,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第75页。

② 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长城战役》,第44页,台北“国史馆”1980年版。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09页。

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1月3日上午,日军在陆海空三军优势火力的掩护下,主攻山海关南关南门一线,中国守军伤亡过半,但仍勉力支持,奋勇杀敌,多次将敌击退。午后,日军增加兵力和进攻强度,主攻山海关东南城角,中国守军安德馨营与之血战,全营600余名官兵皆尽职殉国。午后2时,日军突破东南角,南门随之失陷;东门、北门的侧、背立即暴露,遂无险可守。第626团团团长石世安振臂高呼,率留守西门的团预备队与日军步兵、坦克展开殊死巷战。不久,“卒因兵力薄弱,武器悬殊,伤亡过重,捉襟见肘,无险可守”,^①山海关四门皆破。第626团守关部队战至仅剩十余人才在石团长率领下艰难突出重围,山海关及临榆县城(设于山海关内)遂沦入敌手。

日军侵入山海关后,大肆杀戮中国伤兵和无辜百姓,“城内商店毁于战火者五百家以上,人民死伤千余”。^②山海关之役,中国守军以两营兵力(第626团第2营驻防于孟家店、角峙等地,未及参战)1300余众抗击近3倍于我并装备大大优于我之敌,杀敌400余人。^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榆关得手后,曾派一部乘胜沿平榆大道进攻五里台,被何柱国部击退。

日军略事休整后,又于1月10日沿长城一线继续西侵,向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石门寨发起进攻。当地中国守军亦奋起抗击,与敌激战多次,分别于12日晚和21日撤离两地。此后,日军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一线转入战略防御,对长城沿线中国驻军取侧翼牵制态势,而将扩大侵华的主攻方向转向热河省。

1932年3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的伪“满洲国”

① 《长城战役》,第48页。

②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78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10页。日方自称死官兵80余人,受伤200余人。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前导,纵深展开于平泉、承德、滦平地区,为其后援。

2月23日,三路日伪军均兵临开鲁、朝阳、凌南、凌源城下,热河之战全面爆发。开鲁守军第17旅旅长崔兴武于开战当日,即率部投降日伪,沦为汉奸,日军第6师团兵不血刃,即占开鲁,并再将兵锋直犯赤峰,孙殿英军稍作抵抗亦弃城而去,转守围场。日军第6师团遂占赤峰,随即以一部兵力续攻围场,指向多伦,策应其第4骑兵旅团,其余兵力则转而南下,与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会攻凌源。

朝阳守军董福亭旅所属邵本良团,在开战不久,亦叛变投敌,董旅防线遂被敌楔入,朝阳外围之南岭、北票相继失守,整个防线随之动摇。2月25日,朝阳沦陷。日军第8师团直趋凌源。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掠凌南后,亦于同期寇犯凌源,三路日军开始会攻凌源。

凌源扼平泉、承德要冲,为日军侵占承德直至热河全境的必经之地。凌源中国守军于兆麟旅在凌源外围叶柏寿地区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全旅将士奋勇当先,浴血杀敌,以惨重的伤亡代价顽强阻止优势敌军的进攻,孤旅坚守凌源三昼夜。2月28日,于旅向第4军团总部急电求援,军团司令部即令第29旅火速驰援。该旅之第684团急行军13小时抵达叶柏寿,增援于旅。此时,日伪军在汉奸邵本良的引导下发起强攻,第684团与于旅并肩作战,继续苦守叶柏寿达两昼夜之久。3月初,日军楔入第684团与于旅的结合部,于旅为避免遭敌合围,遂撤往平泉,与第29旅主力汇合,坚守平泉。第684团本拟随于旅后撤平泉,因被敌截断,遂向围场方向突围,与孙殿英第41军一部会合。此时,第5军团由于开鲁、朝阳作战失利,丧失抗战信心,由建平大步西撤至平泉一线。

第4、第5两军团会合于平泉,本可以构成颇具实力的新防线以抗遏日伪。但由于两军分属东北军内两个派系,不愿合作,各图

保存实力；加之汤玉麟等对日伪观望动摇，无心抗战，所以，他们并未坚守原地作战，而继续退却。第4军团在平泉以西的后续部队纷纷撤向西南，经长城喜峰口撤至关内，不久，军团司令部也随之撤入喜峰口。平泉守军亦弃守平泉，随全军团撤入喜峰口。汤玉麟部第5军团失去右翼侧应，急调驻守隆化的军团预备队张从云旅（第7旅）南下承德，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砬一线构置防御。3月3日晚，张旅与前出至承德东郊的日军展开激战，坚守一夜。张作相命汤部在承德周围布防，“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① 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竟扣留军车等二百余辆，由承德装载私物运天津。张作相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逃往古北口”。^②

4日拂晓，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遣兵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汤军从前线溃逃至承德的部队未及展开，又纷纷后撤，全线动摇。张从云旅也弃守青石砬一线，其一部继续西撤，经长城古北口入关；大部队则随汤玉麟北撤至丰宁县，经大阁镇、大滩，退往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守卫围场的孙殿英部稍事抵抗亦经多伦撤往张家口，日军第6师团一部进占围场。至此，热河全境沦陷。

日军占领热河，使华北的屏障尽失，门户洞开，是中国方面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败。导致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处在激烈的政争中，上层人物忙于争权夺利，无法集中全力来指挥、组织作战；二是前线的个别指挥官如汤玉麟，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与敌作战，稍触即溃。

热河失守，全国哗然，民众纷纷要求惩办不战而退的将领，有

①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04页。

②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04页。

“50年来未有之侮辱”。^①

热河沦陷,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任命黄绍竑为其参谋长,统一指挥长城抗战。何、黄到职后,据蒋介石所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②的方针,对长城沿线中国军队部署作了相应调整。鉴于由热河溃退的部分东北军实力大损,且张学良辞职对其士气也有影响,遂将其撤往后方休整改编。令第57军(军长何柱国)、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守山海关西侧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一线;令第32军(军长商震)守冷口一线;令第29军坚守最关键之中段——喜峰口、罗文峪一线;令东北军精锐王以哲部第67军守古北口一线;同时令新调来的南京政府精锐第17军(军长徐庭瑤,下辖关麟征第25师、黄杰第2师、刘戡第83师、李家升第1骑兵旅)增援古北口一线;令傅作义统率的第59军守独石口、镇岭口、怀柔一线,以掩护长城一线我军北翼。后又令孙殿英之第41军,自沽源起与傅作义部同线展开,以监控多伦方向并策应傅部。^③

日军进抵长城一线后,关东军司令部要求于3月中旬之前,占领长城各口,以“一面确保长城要隘,对华北方面加强戒备;一面继续扫荡(热河)省内残敌,以恢复治安”。^④3月上旬末、中旬初,日军相继于长城各口,对中国守军发动了第一次全线攻击。在喜峰口中国守军初战大捷的鼓舞下,中国守军均顽强抗御,力战报国。

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一线中国守军顽强阻敌,阵地虽经敌

① 《中华民国史纲》,第400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7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9~391页,第442~512页。

④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5页。

多次猛攻,经过大小战斗 20 余次仍屹然屹立。有的地段虽被敌楔入,但将士们反复冲击,舍命夺回;有的地段多次失而复得,形成拉锯战,战况惨烈,至 3 月中旬,中国守军阵线仍然基本稳定。冷口一线,“4 月上旬,敌军突以优势兵力,向我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亦奋勇杀敌,炮兵多次有效射击敌装甲车部队,阻遏了其攻势,坚守 5 天后,于 4 月 11 日放弃冷口,被迫撤至滦河东岸之前进阵地,与敌对峙。^①

古北口东北军第 67 军在完成了阻击敌先头部队的任务之后,撤至滦河西岸休整,于 3 月 10 日交防于第 17 军第 25 师。该师在师长关麟征率领下,奋勇出击,迅速占据古北口周围之各高地。在有的高地已被日军先占的情况下,该师将上冒死冲锋,力战夺回。师长关麟征因此受伤。关受伤后,由副师长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统率全师与敌鏖战。随后,第 17 军其余各师、旅陆续抵达,遂以 3 师 1 旅兵力交替轮番与敌接战,至 4 月上旬,日军未能越我防线一步。

喜峰口中国守军挟初战大捷之威势,继续狠击日军。面对日军的飞机、装甲车、大炮的猛烈轰击,第 29 军将士在“行则堕指裂肤,息则卧雪嚼冰”的冰天雪地里,与敌展开近战、夜战,以手榴弹、大刀沉着应战,短兵接敌,拼死肉搏,使喜峰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3 月 17 日,日军铃木旅团三四千人在 20 余架飞机支援下向罗文峪等处进攻,中方守军奋起反击,“反复争夺阵地十余次”,并于夜间从两翼夹击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营长阵亡,全营生还者仅七十余入”,^②战至 4 月上旬,喜峰口一线我军阵地仍岿然如初。

①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 226 页。

②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 1 卷,第 112 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日军在长城沿线月余无进展,“担心补给线被切断而使战局逆转”,“对此紧急状况,关东军命令积极作战”。3月27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下令开始对长城沿线发起第二次全面进攻,将进攻重点放在喜峰口至石门寨的滦(河)东(岸)一线,特别指向冷口方面。^①

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一线何柱国守军自3月下旬以来,虽多次击退敌军攻势,但已伤亡惨重。北平军分会在3月中旬已注意到在整个长城防线上何军孤军突出,且受日海军威胁,万一冷口、喜峰口被敌突破,敌即可长驱直下滦洲、唐山一线,截断何军退路并合围之。为缩短战线,于3月20日令何军撤至滦河西岸,并破坏桥梁,依托滦河构置新的防御。^②何军于3月下旬开始执行命令,将主力渡河西撤。为掩护何军撤退,第53军、第51军组织兵力坚守原防线至4月上旬,随之亦西撤。三个军西撤后,仍与日军隔河对峙,牵制了日军兵力,自侧翼有力掩护了冷口、喜峰口方向。

4月11日,日军第6师团长板本指挥3万余人以优势兵力强攻冷口以南至滦东沿线,冷口中国守军虽努力抵抗,但终被敌全线突破,冷口中国守军遂后撤至滦河西岸。此时滦东长城一线,仅剩喜峰口仍在我军之手。自3月中旬,日军见无望直接拿下喜峰口,即重点转攻其西侧的罗文裕,企图从侧背迂回喜峰口。坚守罗文裕的第29军将士,“咸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③连续与日军血战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5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0页。

③ 《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月余,致敌溃不成军。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参战,近敌挥刀砍杀。以至一度时期内,“罗文裕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①冷口全线失陷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南占迁安,扼滦河上游;主力折向西北,迂回喜峰口—罗文裕侧后,对第29军形成前后夹击合围态势。鉴于此,第29军已不得不后撤。4月12日,北平军分会令第29军后撤,第29军遂撤至平谷、三河以东地区,沿蓟运河展开布防。喜峰口被日军占领。

4月15日,日军集中由围场方向转进的第6师团部分兵力、第8师团主力、第33混成旅团一部以及由多伦转进的骑兵第4旅团一部转攻古北口方向,并配之以强大的空军、装甲部队,希图一举突破古北口,击溃长城全线中国守军,并由西往南迂回中国军队侧背,配合长城沿线正面日军,合围中国军队于平津以东地区。古北口中国守军仍以3个师1个旅的兵力交替轮番英勇抗击日军,并“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阵地构筑,积极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②顽强阻遏了日军的攻势,使战线出现了双方对峙之局面。在双方对峙期间,第17军各师及骑兵第1旅多次组织、派遣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军,给敌后方部队以沉重打击。敌久攻古北口不下,遂自4月21日起转攻与古北口一线的南天门,迂回古北口。第17军遂将第2师与第83师的主力守南天门,两师中国守军与敌血战8个昼夜,“致敌伤亡,为‘九·一八’来所少有”,而南天门阵地仍固守在我军手中,“殊出敌预期之外”。^③

古北口、南天门一线中国守军的顽强固守,使长城沿线敌我军事态势成胶着状态。滦东地区南段,我军与日军隔河对峙;滦东地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1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

区西南段与北段,我军沿平谷—三河—蓟县—玉田—遵化即蓟运河东岸一线与敌对峙。

因担心久攻不下引起国际干预,关东军曾一度接受天皇命令,将进入滦东的日军撤出。^① 中国军队相机进行局部反攻。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扩大不扩大(战争)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要求内阁承认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进击,以利速战速决。^② 5月3日,关东军在军部和内阁的支持下,决定在积极补充消耗兵员和装备的基础上,对滦东及整个平津外围地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企图“予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并要求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军和以旅顺口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2外遣舰队,“以严肃态度支援关东军”。^③ 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命令关东军“断然对长城沿线所有中国军队反复进行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导致瓦解”。^④ 长城抗战进入了第三阶段。

5月7日,日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势,由经补充加强的第6师团,第14及第33混成旅团,出冷口、迁安一线进攻滦东地区,威胁天津;以海军第二外遣舰队沿秦皇岛—塘沽海岸线侧应之。由经补充加强的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一部倾全力进攻占北口,企图攻占后直下密云,进迫北平,从北南两路对我平津地区形成钳形攻势。

①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24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5页,第226、227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9页。

④ 《现代史资料(下)满洲事变》,第515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因两月苦战,人员、装备均损失极大;南京政府将重兵用于“剿共”,致长城一线无后援部队,中国守军均陷入孤军鏖战;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对日媾和,无心再战,遂使第三阶段长城抗战迅速出现不利的局面。

5月7日,日军突破滦河东岸突出部中国守军第51军防线,继而向两翼扩展。5月11日夜,从多处地段同时渡过滦河。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于学忠、万福麟率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并令商震、王以哲等部也撤往该线,与北部第29军据守的平谷—三河防线衔接,组成新防线。5月16日,日军占领遵化,17日侵入玉田,18日攻陷玉田,19日占领蓟县,至5月下旬,南路日军主力侵占了秦皇岛、北戴河、抚宁、卢龙、滦县、昌黎、唐山、乐亭等县,推进到芦台,直逼天津;另一部日军在占领遵化、蓟县后,向北迂回,进迫古北口、南天门中国守军背后,企图与正面进攻之日军合围我该地守军。北平军分会急令傅作义部向怀柔一线展开,阻击日军。^①古北口—南天门一线中国守军自5月10日起又连续与敌血战4天,第2师、第83师几乎伤亡殆尽,但仍坚守不退,致敌不能得逞。14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发动总攻,第25师与敌激战3小时,将敌军拼死击退。后日军又反复进攻,第17军将士咸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气概,节节抗击,直至阵地全部化为焦土,仍拼死固守。鉴于第17军伤亡殆尽又无补充,北平军分会于5月14日令其撤往密云。^②古北口—南天门落入敌手。古北口抗战前后两月有余,予敌重创,悲壮激烈,是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一战,连日军也称之为“激战中的激战”。^③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3页、第395页,第495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3页、第395页,第495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页、第491页,第504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第17军后撤后,北平军分会令第26军(军长肖之楚),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敌前接防。^①北路日军乘势于5月19日占领密云。21日,进抵怀柔之郊。傅作义第59军自抵怀柔之后,从5月15日至20日,“不分昼夜地加紧构筑工事,并得到当地人民的多方热情援助”。^②5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进抵怀柔,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旋即被击退。5月23日拂晓4时,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后,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怀柔沿线中国守军发起强攻。59军与敌连续血战15小时有余,击退日军11次进攻,致敌死伤千余人,我军防线完整无缺;并拟于当晚遣精锐夜袭敌营,灭日军虎狼之师之凶焰。是晚7时,突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集结。”此后,何又三次致电傅作义,命令全军立即开始后撤高丽营一线。^③午夜,第59军以团为单位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后撤,集结于高丽营一线,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仗就此结束。

5月下旬,日军进至顺义附近,其前锋距北平仅50余里,同期,原从遵化、蓟县向北迂回企图突袭、夹击古北口的日军,见古北口已破,遂西攻三河,第29军守卫部队也奉令后撤通县,日军随之进迫该地。南路日军占滦东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据芦台威逼天津;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缺乏后援的中国守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力支撑,与日军对峙。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页、第491页,第504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页、第491页,第504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7、508页。

三、《塘沽协定》

1933年3月30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长。此前,蒋介石已定下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汪到任后,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谈判的政策。4月中旬以后,汪一面寻找、委托第三国斡旋,一面派出亲日派、知日派人物多方奔走,频频与日本驻华、驻外官员接触,探听日方真意。4月27日,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在沪对日本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根本博中佐,转达了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当时日本当局鉴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之英勇抵抗,担心孤军深入并被中国军队入热河切断其补给线而全军覆没,加之英美等西方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这一时期日苏关系亦趋紧张,因而同意与中方谈判。4月29日,关东军电示根本博,若中国军队按日方要求撤军,可以谈判。“根本博在上海,按照关东军的示意,与中国当局探索双方停战意向,停战问题逐步趋于具体”。^①

5月3日,国民政府按照早已内定之计划,任命亲日派人物、前外交部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具体负责与日方谈判。日本为取得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并压服南京政府接受其条件,发动了长城战役的第三阶段攻势。5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果断然放弃原来的挑战态度,撤退至远离(伪满洲国)国境线(此时已指热河省境)地区,我军将迅速回到长城一线。”5月17日,关东军在《关于长城以南地区第一次作战的停战善后处理方案》中提出:“要利用华北方面战局进展有利的现状,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而提议停战,我军即接受提议,进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8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行谈判。”^① 在日本硬软两手交替作用下,5月17日,“黄郛认为时机成熟,自上海赶赴北平。”^② 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日本驻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负责停战谈判。同时,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及驻平津地区日军下达了《华北方面停战指导要领》。

5月22日,黄郛与永津等进行了初步谈判。“经彻夜协商达成协议,于23日晨拟成《停战方案备忘录》。当日午后,何应钦即予以承认。”^③ 这就是何应钦急令傅作义部和第29军驻守三河部队后撤之内幕。备忘录系日方提出,内有停战条件四项,并约定择日由双方代表达成正式停战的成文协定。^④ 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徐祖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义赴密云,对日军第8师团长两义一中将正式提议停战。然后在日方拟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⑤ 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

在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之时,国民政府却积极谋求对日妥协。消息传出,全国民众与舆论哗然,反对之声骤起。但汪精卫、黄郛等意志甚坚,汪精卫在给黄郛的电报中称:“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任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⑥ 5月25日,南京国防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但要求“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⑦

① 《现代史资料(下)满洲事变》,第516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31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31页。

④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42页。

⑤ 熊斌:《塘沽协定经过》,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69页。

⑥ 《汪兆铭致黄郛电》,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0页。

⑦ 《汪兆铭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8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日本海军舰只同时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谈判开始,中方随即提出了有关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见书。日方提出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基本内容与5月23日晨的《停战方案备忘录》大致相同。冈村宁次则蛮横地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意为日军在战场上占据了有利态势),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①威逼之意,溢于言表。5月31日,在日方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的条件下,中方首席代表屈辱地签了字,被称之为《塘沽协定》的城下之盟终于产生,并立即生效。

协定规定:“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接之线以西及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动。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三、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②协定的丧权辱国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据此协定,河北省滦东等地的19个县被划作了“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无设防权力;协议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平津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232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232页。

地区在日军武力威逼之下大门洞开。战后日方亦承认：“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①《塘沽协定》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提供了条件。协定签订之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天津《大公报》在社论中指出，协定中“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要求当局“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②胡适则直称协定签订是个“国耻的消息”。^③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长城抗战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继续奉行了对日妥协政策。日军进犯热河后，国民政府虽继续了一二八时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实质上外面抵抗，心向交涉，以抵抗作为利于交涉的筹码。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刚刚失败，正坐镇南昌，忙于整顿、调集重兵，以图再战。日军正是利用此，才敢于以相对不多的兵力挑起战争。蒋介石虽两次赴华北进行布置，但他多次表示，要以现有兵力尽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汪精卫兼任外长后，鼓吹对日谈判，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南京政府终于转向“一面交涉”，断送了广大抗日将士长城浴血抗战的战果。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不图自立自强，一味寄希望于国联及西方大国的干预。日军侵犯热河之始，国联及西方大国当即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也一再呼吁国联及各大国实施对日制裁。但面对日本的蛮横独行，西方列强一时束手无策，除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233页，第227页。

② 《中日停战协定痛言》，载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1日）。

③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以言词继续显示强硬立场外,未能采取有效约束日本的有力行动。南京政府的“希望”亦自然落空。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差距是明显的,日军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即有3万余人,其总兵力虽不占优势,但武器占尽优势;飞机、重炮、装甲车乃至军舰一应俱全。中国守军虽番号众多,但齐装满员者不多。如第29军3个师合计为22000余人,一部留守阳泉等地,开赴华北前线的仅15000余人。齐装者更少,该军三分之一的枪械为老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竟是军械所以旧枪械拼装制造的,重武器尤其缺乏。^①与日军进行阵地攻防战,中国守军被敌重兵器杀伤甚众。不过,当时中国军队并非没有优势可言,作战过程中日军最担心的是:“日军补给线通过艰难的热河省,易于断绝。”^②而中国军队只是一味防御,未能实施机动作战,深入敌后,切断敌后勤补给线,困毙日军,逆转战局。特别是在两军对峙,日军战力一度殆尽之际,坐失战机,致使日军从容补给,发动了第三阶段攻势。

长城抗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的英勇作战、不惧牺牲精神,尤其是第29军喜峰口的苦战及第17军在南天门一带的血战,都是“最悲壮的牺牲”,^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④长城抗战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47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25页。

③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8页。

第四节 察哈尔抗战

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屡屡丧师失地,并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心“剿共”,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社会舆论哗然,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也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抗战,收复失地,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冯玉祥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活动。

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蒋失败后,隐居于汾阳。在此期间,他与社会各界仍保持着联系,关注国内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数次致电南京政府,痛斥不抵抗政策,提出抗日救国主张。淞沪抗战爆发,冯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发兵10万驰援19路军;沿海各口岸守备炮兵同时炮击日舰,使日军穷于应付;再调北方军队主力反攻,全歼入侵日军。^①不久,冯在其西北军旧部属韩复榘邀请下,移往泰山隐居。1932年秋,冯见韩复榘对蒋介石日益效忠,对自己时时防范,遂想别移他处。适逢南京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宋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察省又近抗日前线,便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冯玉祥遂于1932年10月9日移居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

热河沦陷后,大批原驻防热河的东北军部队和义勇军部队退入察哈尔省,其他不愿投敌的零星部队,也陆续辗转退入察省。当

^①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7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时宋哲元正率部血战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察省代理主席许庸以去北平请示局势对策为名，一去不返。日伪进犯热河后，便分兵西进，直犯塞外重镇多伦，并继续南侵，察省危在旦夕，省内军民均盼德高望重的冯玉祥将军出山主事。“上海广州等地有六十个以上的人民团体曾急促冯氏领导抗日”。^① 在国难当头之际，冯玉祥多次对察省军民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决不能等着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立即拿起枪来，实行抗战。^②

冯玉祥立即着手组织武装。离山西后，他在汾阳所办的汾阳军官学校改编为当时驻山西的第29军教导团。冯玉祥急电该团，令其开至张家口。抵达后，冯将其扩编为师，任命佟麟阁为师长。同时，冯电召其西北军旧部下占鸿昌（当时已为中共党员）、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人赶赴张家口，改编、整顿退入察省且无人指挥的零散部队和零散东北义勇军。一些将领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充作军费，购置枪支装备部队。未几，便整编部队15000余人。退入察省尚有组织的部队及东北义勇军，还有部分内蒙古自卫军共40000余人，均表示服从冯玉祥指挥。冯亦将其整编，并将上述所有部队暂时统称为察哈尔民众自卫军。

同时，曾任第6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方振武在晋南介林组织了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1933年2月1日，举行誓师，通电抗日。2日晨，全军出晋南，过晋东东阳关，4月下旬经涉县抵邯郸，沿平汉路北上进抗日。4月底5月初，方军陆续抵张家口，与冯玉祥所率察哈尔民众自卫军会合。

1933年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守军后撤，

① 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94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1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察省告急。张家口各界代表和各支部队,立即召开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以第29军教导团扩编的师,吉鸿昌等改编的零散部队和义勇军,方振武军,退入察省尚有组织的部队与义勇军等4支队伍,计8万余人为基础,组建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会公推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将军任同盟军总司令。

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于张家口联名发出通电,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组成。冯玉祥正式就任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邱山宁任参谋长,佟麟阁暂代察省主席,吉鸿昌任察省警备司令。通电声明:“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①

大批民众及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大、中学生,受其抗日精神之感召,成群结队赶赴张家口参加同盟军。短时间内,同盟军便发展至十余万人。抗日高潮在察省骤然形成。冯玉祥等首先对同盟军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及鼓动工作;同时加强军事训练,积极筹补给养、改善装备。短时间内,便将这支队伍塑造成了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抗日有生力量。不少中共党员在党组织支持下也参加了同盟军,并成为其骨干,如吉鸿昌、宣侠父(任第5师师长)等等。

6月15日至19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主要内容包括: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大会选举产生了

^①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军队的军事、政治、财政等事宜。共有委员 35 人、候补委员 29 人组成。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邱山宁、宣侠父等 11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①依冯玉祥所拟的计划,同盟军的抗日目标分三步:“第一步先行收复察东失地;第二步收复热河;第三步收复东三省。”^②

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及其解体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组建后,按照既定作战计划,其主力兵分两路,南路拱卫平绥线及张家口,北路积极准备收复察省失地。^③6月20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22日,同盟军王德重部首战康保,力攻克复,全军士气大振。23日吉鸿昌、邓文等部疾进宝昌;李忠义等部直趋沽源。7月1日,敌我两军在两城外围展开激战。吉、邓等部力将盘踞宝昌的伪军张海鹏部击退,收复宝昌。“是役,俘获甚众,内有白俄 37 人。”^④张部伪军向多伦溃逃,与盘踞多伦的日伪军汇合。同日,沽源伪军刘桂棠部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临阵反正,另一部伪军被击退,同盟军光复沽源。同期,同盟军还收复了黄旗大营子等地。

7月3日,同盟军大部队乘胜进军,向察北军事重镇多伦推进。多伦位于内兴安岭的西口,系联系察哈尔与热河的通道,此时由日军第4骑兵旅团一部2000余人及伪军张海鹏等部盘踞,为

①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 203 页。

② 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 300 页。

③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 104 页。

④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 210 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防止同盟军来攻,日伪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及装备,“在多伦城外构筑8排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沟壕及电网等工事”。^①

7月4日,同盟军张凌云部在多伦外围七里河孤子山与日伪发生前哨战,将敌击退。7月5日、6日,进军多伦的同盟军各部相继进入攻击阵地。7日,吉鸿昌、方振武下达进攻多伦总攻击令。当日夜间,同盟军开始行动,经彻夜激战,至8日拂晓,连克敌两道外围防线。8日到11日,连续与敌血战,吉鸿昌亲自指挥敢死队几度奋力突袭,同盟军直抵多伦城下。11日,同盟军从拂晓起对多伦发起总攻,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各部队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亡累累,遂暂退守原阵地。”^②在此受挫之际,冯玉祥向前线将士发去电报,激励他们以死报国,电称:“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③

11日晚,吉鸿昌派数十名战士化装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同盟军再次发动总攻,潜入城内的同盟军战士四处出击,以为内应。同盟军很快突入南、北、西三门,“吉将军亲自赤膊抡大刀片上阵,全军将士均奋勇杀敌,浴血苦战”,^④与日伪军巷战3小时,将其大部歼灭,残部由东门夺路溃逃。

经连续5昼夜苦战,沦陷72天的察北重镇多伦,终被同盟军收复。至此,察省失地全部光复。在收复察省四县市的作战中,抗日同盟军伤亡官兵1600余人,其中阵亡者212人。日伪军毙命者千余人。^⑤

察省光复后,东北的爱国军人、爱国青年群集察省,集议成立

①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04页。

②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2页。

③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04页。

④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3页。

⑤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3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冯玉祥表示：“愿亲率十万饥疲之上，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① 7月27日，在冯玉祥领导下，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内设军事、政治、经济、秘书四局，主任均为同盟军骨干。

蒋介石对同盟军的兴起与发展极为恐惧，同盟军领袖冯、方、吉等人皆为其宿敌，与之积怨甚深；又察知同盟军骨干中有不少中共党员，深惧中共党员发动民众，在华北形成抗日民主运动局面；蒋还担心同盟军刺激日本，招致日军以此为借口再度进攻。同盟军收复多伦后，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柴山特为此走访何应钦，对何讲：“日本对此事，认为有违《塘沽协定》，请予注意。”^② 同盟军兴起，蒋感到妨碍他“政令军令之统一”，深忌之。基于上述诸多出于个人统治权力的考虑，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以抗击侵略、收复失地为职志的同盟军不仅未予任何支援，反而力图早日扑灭。

蒋为消灭同盟军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手段。其一，拉拢诱惑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努力使之“归顺”。同盟军进攻多伦之前，何应钦代表南京政府“请冯玉祥就全国林垦督办职”。多伦激战之际，汪精卫又代表南京政府邀冯玉祥赴南京，“徐图救国根本之计”。^③ 对方振武则许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督办公署驻地可在张家口、大同、归绥三城市，由方自己选择决定之。^④ 在冯、方等拒绝了南京政府的拉拢诱惑之后，蒋介石便令何应钦等竭力收买冯、方的部下，从内部瓦解同盟军。同盟军领导骨干张人杰、李忠义、冯占海、鲍刚等高级将领先后被何应钦收买，率部脱离了同盟军。

① 《冯玉祥为克服多伦致南京、北平当局电》，《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9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6、537、585页。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85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其二,以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的名义,谴责冯玉祥、方振武等人“擅自行动”,“意图赤化”,对其发动宣传攻势,施加政治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6月初,国民党中央授意南京市党部发表通电,诬责冯“冒名抗日,割据地盘”,“宣传共产,实行赤化”。并要求中央开除其党籍,下令讨伐。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开会后,一致通电冯玉祥(俭电),要冯“(1)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2)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3)勿滥收散军土匪;(4)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并威胁冯,称同盟军之事“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①

其三,调集重兵,对同盟军形成封锁包围态势,断绝同盟军军需的供应,并积极准备直接诉诸武力镇压同盟军。7月3日,蒋介石密电汪精卫,称冯“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并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方法”。7月17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表示:“已一面令庞(炳勋)、傅(作义)各部,冯(钦哉)、关(麟征)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②至7月下旬,何应钦已在同盟军周围集结了16个师,15万兵力,并配有铁甲列车、飞机等。

在蒋介石积极筹划镇压抗日同盟军的同时,日伪更在丰宁、多伦东侧一线积极备战。多伦克复后,日军遣使向冯玉祥提出要其让出多伦的“觉书”,冯玉祥断然驳斥,并向日军提出要其让出热河的反要求。日军威胁要对同盟军“加以膺惩”。^③随后,日军出动第4骑兵旅团主力、第6师团一部及伪军张海鹏部2万余人,进迫

① 《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

②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多伦、沽源等地，与蒋军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态势。

面对上述形势，加之同盟军财政困难，军需短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于8月4日召开会议研讨对策。冯玉祥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坐收渔人之利，他决定下野。应使宋哲元早日返察省主事，同盟军名义虽不存在，但这一支抗日力量可借宋的掩护得以保存。8月5日，冯玉祥通电全国：“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①9日，冯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撤销同盟军总部。14日，在韩复榘的再次邀请下，冯离开张家口赴泰山“休养”。同盟军部队（除方振武、吉鸿昌部）有的被宋哲元第29军收编，有的自行解散。

方振武、吉鸿昌在8月初的同盟军军委会上，对冯玉祥的决定即不表赞同。冯离开张家口后，在吉鸿昌的倡议下，同盟军方、吉两部公推方振武为同盟军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两人随即通电就职，继续抗日救国活动。随后，方、吉二人率其所部同盟军撤出张家口、多伦等原驻地，8月下旬，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沿途宣传抗日，组织民众。但因军需补给困难，方、吉决定南下进占北平作为根据地，补充整顿，联络各方，再继续北上抗日。9月中旬，方吉联军抵北平北郊之昌平区。下旬，占领北平以北的大、小汤山地区。何应钦急调军队从东、南、西三面围困之，日伪军也从北面向其迫进，日伪军并多次轰炸、炮击同盟军阵地。10月中旬，北平许多社会及民众团体倡议何应钦与方、吉联军和平谈判，力避内战。随后，双方开始接触，达成了保证方、吉二人安全自由，师长以上干部不咎既往，旅长以下干部发资遣散，军队由商震部第32军收编的协议，协议立即执行。^②察哈尔民众

①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24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91页。

抗日同盟军至此完全失败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其抗日业绩永垂中华民族之史册。其抗日精神,感召了全国民众。同盟军兴起之时,察省人民即在财、物、社会舆论上多方大力支持。多伦光复后,上海、天津、北平、西南及华北各省市民众抗日救国团体均纷纷致电祝贺,“并踊跃捐助进行慰劳”。^① 即使蒋、何所调围困同盟军的军队中的爱国将士,也纷纷消极抗命,不忍向同胞开枪。后来,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收编了大部同盟军将士,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商震还违抗何应钦密令,释放了方、吉二人。^② 正由于各方的声援,才使蒋、汪始终未敢下令进攻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激发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

一、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进而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严峻形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政党、军队,实现大

①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4页。

② 占鸿昌将军于1933年11月在天津法租界被南京政府引渡逮捕,押往北平杀害。方振武将军失败后出国。七七事变后,返国抗战,任抗日救国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后被特务暗杀于香港。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联合,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①它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起了直接指导作用。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作出了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及其指挥部,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

此后,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第5、第4、第3、第6各军先后在黑龙江的宁安、汤原等县开会,讨论东北抗日部队联合作战的问题。

翌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该宣言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各反日游击队,为着组织巩固与行动统一,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②该宣言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署名发表。此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率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为副军长,胡仁为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为参谋长,全军3000人。

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分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和第4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全军2000余人。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3月李延禄奉调入关,李延平代理军长。1937年,李延平正式任军长,吴平任政委,胡伦任参谋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2100余人。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6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69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7月、8月、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3、6军,相继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3、6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所部3000余人。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委冯仲云,张寿篈任政治部主任,全军6000余人。第6军军长夏云杰,张寿篈为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共有官兵2000余人。^①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是由饶河反日游击队发展而来的。1935年9月,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1936年3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15日,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全军700余人。

东北抗联第1至第7军,是中共直接创建和领导的队伍,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是东北抗日力量的主体和骨干。

中共在组建东北抗联第1至第7军同时,还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8、9、10、11军。

1934年3月,土龙山地区农民群众举行反日暴动,并组织了民众救国军,打击前来镇压暴动的日军。10月,民众救国军遭受重挫,余部在抗联第3、4、5军的帮助下得以坚持和发展。1936年9月,该部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8军。谢文东为军长(后叛变),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该军仅有300多人。^②

东北抗联第9军,是原东北军李杜部李华堂支队发展而来的。该支队在1934年底遭到重大损失,后在抗联第3、5军的帮助下,于1937年1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9军。李华堂为军长(后叛变),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李向阳为参谋长。全军800人。^③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56页,第359页,第362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3页。

③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3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抗联第10军,是由“双龙”反日山林队发展而来的。该队在中共珠河县委和抗联第3军的帮助下,于1936年冬,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10军。汪亚臣任军长,齐云禄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1000余人。^①

抗联第11军,是由桦南县驼腰子金矿工人抗日起义队伍发展而来的。这支队伍,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于1935年5月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1937年10月,独立师正式改编成抗联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有官兵1500余人。^②

东北抗联第8、9、10、11军是接受中共领导的友军。这4个军,特别是第8、9军成员复杂,政治工作薄弱,组织纪律较差,因而战斗力较弱。

除了抗联的11个军之外,接受中共和抗联指挥的抗日武装还有:姚振山的抗日义勇军600余人,李洪宾的抗日救国军1000余人,王荫武、王凤阁的抗日救世军各1000余人,^③左子元的抗日救国联合军400余人,^④等等。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是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成果,它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有利于东北各抗日武装的团结对敌,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的发展。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③ 常城:《东北近现代史纲》,第21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版。

④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1936年3月,杨靖宇指挥第1军,在辽宁辑安县三道崴子全歼日军讨伐队,缴获迫击炮多门。同年7月15日,抗联第1军第1师在本溪县摩天岭大榆沟伏击尾追之敌,毙日军今田大尉以下30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枝弹药。8月4日,杨靖宇率第1军军直部队,在通化四道江地区伏击伪军邵本良部,打死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伪军5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①日军因邵本良屡遭失败而将其毒死。邵本良是大汉奸,曾被日军封为伪陆军少将。痛歼邵本良的胜利,使抗联第1军声威大振。此后,活跃在宽甸、本溪一带的许多义勇军、救国军,纷纷要求改编为抗日联军或接受第1军的领导与指挥。8月下旬,杨靖宇将左子元领导的抗日救国联合军,改编为抗联第11独立师。9月13日,杨靖宇指挥第1军教导团和第11独立师,采用化装袭击战术,攻占了宽甸县大荒沟街,俘日伪军30余人,缴枪30余支。9月29日,第1军教导团和第11独立师在宽甸县错草沟设伏,击毁敌汽车9辆,毙伤日军曹臼井彦次郎等40余人,使敌人大为震惊。^②在此前后,杨靖宇还把抗日军高维国部、于万利部分别改编为抗联第13独立师和游击大队。这类接受抗联第1军领导,又保持独立性的抗日武装达七八百人以上。^③第1军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使敌人大为恐慌。12月,第1军与10倍于己的日伪军周旋,激战月余,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杨靖宇的名字,使敌闻之丧胆。

抗联第2军改编之后,与第1军协同作战。1936年7月,第2军和第1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8月17日,第2军第6

①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5页。

②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9页。

③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9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师,联合抗日义勇军,进攻抚松县城,摧毁敌东山炮台,毙敌数十人。9月初,第6师在长白县大德水、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地击敌,歼灭了一批敌人。9月12日,第2军和第5军联合反日山林队黑山队在穆稜县磨刀石地区设伏,颠覆日军用列车,毙伤日军工兵1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给养。日军哀称其为“九一二事件”。^①1936年秋冬至1937年春,日军进行冬季“大讨伐”,第2军主力和第1军第2师密切配合,转战长白山区。12月,王德泰军长牺牲于抚松县小汤河,魏拯民率全军继续战斗。经大小上百次战斗,歼灭了大批日伪军,粉碎了日军的“讨伐”。

1936年6月和11月,抗联第3军改编前后,第3军主力先后分两批到庆城、铁力、海伦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12月,赵尚志指挥第3军西征部队,在海伦冰趟子设伏,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中包括7名日军指挥官,缴大批武器弹药。冰趟子战斗,是抗联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一。^②翌年3月27日,赵尚志指挥远征队在龙门附近伏击日军汽车,全歼日军“讨伐队”町田少佐以下21人,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

与此同时,留守在松花江两岸的第3军部队,不断击敌。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6月,,他们作战上百次,毙、伤、俘敌11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械弹药。第3军尤其善于联合和改编其它抗日武装。1936秋冬,它在原有6个师的基础上,通过收编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又建立了第7、8、9、10师。使部队扩大到6000余人。从1936年9月至1937年4月,第3军各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和黑嫩平原的部分地区,纵横数千里,大小

① 霍燎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百余战,毙伤敌 800 余人,俘敌 300 多人,攻占城镇 20 多座,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①

1936 年 3 月下旬,抗联第 4 军组建之后,夜袭石头河子金矿,歼敌 60 余人,缴获各种枪械 70 余支,军马百余匹,子弹万余发。^②5 月以后,第 4 军主力部队东征,开辟了宝清、富锦两县新游击区,还将几支抗日山林队收编为抗联第 4 军第 4 师。

抗联第 5 军改编后,留下部分武装在宁安地区坚持抗战,主力向中东路道北转移,开辟新区。1936 年 3 月~1937 年 1 月,第 5 军先后取得了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马莲河、烟筒沟、刁翎小盘道、大盘道等战斗的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大盘道战斗,歼灭敌军 300 余人,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莲花泡子战斗,歼敌伪近 500 名。1937 年 3 月,第 5 军和第 3、4、8、9 军各一部,联合进攻依兰县城,共歼日军 300 余人,俘伪军一个排,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③

抗联第 6 军组建后,以汤原为基地,开辟了依兰、桦川、富锦游击区,广泛出击,打击敌人。1936 年 12 月 21 日,第 6 军军长夏云杰在指挥西北沟战斗中牺牲,戴洪滨继任军长,领导第 6 军继续战斗。1937 年 5 月 18 日,第 6 军夜袭汤原城,歼灭日伪军 500 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参事官、营务处巡官和警士多人,救出狱中的抗日群众,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

抗联第 7、8、9、10 军组建之后,也都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的发展,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7 年 1 月,第 7 军与日伪军激战于饶河县小南河,毙敌

①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 125 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299 页。

③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308 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200 余名,军长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并率军突出重围。

东北抗联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关东军司令部承认:“在对付反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 10 倍的努力,尚不能充分达到目的。”^①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军少将佐佐木亦表赞同:“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将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②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抗战爆发,由于东北人民的局部抗战,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东北日伪军共被消灭 10 余万人,其中 1931 年至 1933 年 3.1 万人,1933 年至 1937 年 7 月 7.3 万人。^③

三、北方少数民族的早期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先遭受日军入侵的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出于民族大义,奋起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蒙古、朝鲜、满等各族人民,即行抗日,坚持不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兴起和东北抗联组建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与之结合,受其推动,进一步发展和高涨。

1931 年 10 月,辽西、辽北一带蒙汉两族人民即组建了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驰骋于辽西平原,奇袭日军。1932 年归建于东北义勇军序列,发展至数万人。1932 年,在绥远成立了有蒙汉两族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大同盟,积极组织、推动了蒙汉等各族人民

① [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28·现代 5》第 280 页,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版

② 《世界历史 28·现代 5》第 280 页。

③ 王明阁等:《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第 146 页,《北方论丛》编辑部 1980 年版。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期,在热河、察哈尔省也由蒙汉两族人民共同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救亡抗日会及抗日十人团等组织,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热河、辽宁一带领导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各民族建立抗日武装。蒙汉及各族人民纷纷响应,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等,于热河前线,英勇抗击了日伪军的进攻。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民族人民踊跃参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绥远土默特旗蒙古骑兵老一团和由蒙古族若干上层人物统领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数万人,亦加入了同盟军行列。1934年7月,察绥地区奈曼旗蒙汉人民群众,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丈量、掠夺土地,组织了有500余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军,攻下日伪警察署,杀死7名日本官吏,接着占领八仙筒,砸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四处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予日军极大震动。1936年2月21日,蒙古族官兵1000余人,举行了百灵庙起义,反对该地区蒙古贵族德王投靠日本。5月,鄂尔多斯草原也建立了第一支蒙古族抗日骑兵游击队,随后掀起了鄂尔多斯抗日风暴。

日军侵占东北后,朝鲜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地投入了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县朝鲜族人民,相继组织了以朝鲜族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3年1月,以这些游击队为基础,创建了东满游击队。后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抗联第2军。抗联第2军中,朝鲜族战士占半数以上。他们在朝鲜人民聚居地区,到处开辟抗日游击区,建立朝鲜人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自卫队、妇女和儿童抗日团体等组织,并在抗日游击区内建立了人民抗日政权。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2军在黑山、罗子沟一带,多次出击日军守备部队,予敌重创。1936年7月,抗联第1、2军进攻抚松城,切断日军警备公路,歼敌300余人。1937年6月,抗联第2军在其他兄弟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部队配合下,粉碎了敌人对间峰山的围攻,歼灭敌人1000余名。1932年4月,朝鲜族中共党员李红光,在盘石县组织了朝鲜族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各族人民抗日示威游行,旋即组成盘石抗日游击队。1933年夏天之后,盘石游击队已发展至2000余人,在大量汉族人民加入的基础上,最后扩编为抗联第1军,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李红光出任东北抗联参谋长。在东北抗联其他各军中,均有大批朝鲜族指战员。他们为开展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北地区是满族人民聚居地区。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也成为东北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满族人民即和各族人民一道,纷纷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工作。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70%以上的满族人民参加了反日组织。^①广大满族人民还争相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哈尔滨工大、商船专门学校、医专、一中、二中等院校的许多满族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满族集中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长为活跃于此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员。邓铁梅、苗克秀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骑兵第5旅旅部40人中,满族指挥员达30人。有的连队,满族战士达70%以上。^②1932年,满族抗日将领富振声等,将黑龙江省东部勃利、林口、密山一带的满汉各族群众的抗日武装,组织成密山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为东北抗联第4军。在东北抗联各军中,都有大量满族指战员,有些人还担任了师以上领导职务。他们卧冰餐雪,浴血抗日,为抗日救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居住于关内的满族各阶层人民群众,以及从沈阳内迁北平的东北大

① 《满族简史》第210页、第21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满族简史》第210页、第211页。

第二章 日本侵略上海与局部抗战的形成

学和其他院校中的许多爱国满族学生,以各种形式支援、参加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二九爱国运动及其他多种反日示威游行,做了大量的抗日救国工作。

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早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早期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彪炳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事业之史册。

本章小结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为逼迫南京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转移国际舆论对其筹建伪满洲国的注意,蓄意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挑起纠纷与冲突,进而以此为借口,步步紧逼中国政府,终于导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第19路军暨第5军广大爱国将士,出于民族大义和全国民众抗日高潮的推动,奋起反击日军的入侵,兴起淞沪抗战,不仅致敌久攻不克,而且予敌重创,是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大进展,弘扬了民族士气。

国民政府虽声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出于“剿共”之需,不肯进一步增派援兵;且仍寄望于国联调停,遂使第19路军暨第5军陷于孤军苦战,终于后撤待援。在西方列强共同调停下,以中国政府作出重大妥协为基础,《淞沪停战协定》得以签订。

1932年3月,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头目的一批汉奸和清王朝遗孽,构成伪满政权的骨干。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的形式,凭借野蛮的、赤裸裸的军事暴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北义勇军逐次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为开展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主体。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东北抗日游击队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在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上地上,四处出击日伪军,将抗日游击战争区域扩大到 90 多个县市。

东北沦陷后,日本按大陆政策既定方针扩大侵华,锋芒直指华北,热河首当其冲。1933 年 2 月,日本遣重兵入侵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或降或逃,东北军万福麟部力战不支,热河于半月内全境沦陷,日军直犯长城沿线,进迫京津。长城一线中国守军激于民族义愤,援淞沪抗战为楷模,奋起抗击,浴血杀敌,顽强阻敌于长城—滦西一线达两月之久。蒋介石专注“剿共”,继续推行对日妥协政策,遂致长城抗战失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纯为城下之盟,中国利益遭致重大牺牲。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不满,自发组织,抗击日军。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领导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光复察省全境,鼓舞了全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东北抗联的斗争、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形势的形成。